

多洛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代浙江進士研究

黃永年題



D691.348

D977

多洛肯◎著

明代浙江進士研究

黃永年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04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浙江进士研究/多洛肯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
ISBN 7—5325—3789—7

I. 明... II. 多... III. 进士—人物研究—研究—浙江省
—明代 IV.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316 号

明代浙江进士研究

多洛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23,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5 — 3789—7

K · 600 定价: 4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序

章培恒

科举制度对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影响极大。就我国的历史来说,其演进的总体趋势固然无法超脱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但就具体进程来看又确有独异于其他国家之处。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当然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科举制度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科举制度的设立,较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原具有从较为广泛的阶层吸引人才以充实各级政府机构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凝聚力与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来统一全国读书人的思想。而且,从宋代开始,随着儒学越来越受到推尊和其后的程、朱理学越来越成为儒学的中心,儒学与社会的前进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而科举考试又越来越以儒学为主臬,所以,科举制度又常常被视为以陈腐的思想来腐蚀人的罪魁祸首。《儒林外史》就是对科举制度的这一功能的深刻揭露。

就这一点说,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日益严重的阻碍作用的、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在读书人中如此普及、被大多数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科举制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导致我国社会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迟缓、与世界前进的总体趋势的距离不断扩大的诸种因素中,科举考试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也并不只具有负

面意义:在政治权力分配中,代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政治力量得以占到较大的份额,实有赖于科举制度。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很大。但由于政治斗争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代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政治力量未必能在权利分配中占有优势。举例而言,在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在总体上较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隋朝的实现统一乃是由北朝吞并了南朝,唐承隋制,在政治格局上并无大的变动,所以,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政治力量在隋、唐二朝的权利分配中显然处于弱势。这对于此类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是不利的——其独特的要求得不到反映和支持,相应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然而,到了明朝,科举制度却成了帮助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在政治权利分配中取得有利地位的途径。正如本书——《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所表明的,像浙江那样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所出的进士也特别多,其中很多人并在政治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就逐渐改变了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局面,从而这一地区的人们也就可以凭藉其政治地位而实现其经济、文化上的要求;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朱元璋即位以后,对工商业发达地区采取了严酷打击的政策,浙江——尤其是其中的嘉兴等地——就是其打击对象之一。然而,这地区的人们由于其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还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在政治上逐渐站稳了脚步,进而又逐渐取得优势。以嘉兴府而论,如同本书所示,洪武朝进士仅四人,永乐朝进到十人,成化朝为三十五人,嘉靖朝达一百十九人,万历朝为一百十六人,崇祯朝为四十九人(按,嘉靖共四十五年,万历四十七年,崇祯十七年;所以崇祯朝的考取四十九人,就

每科考取的平均数来说,较嘉靖、万历朝为高)。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已能利用其经济、文化的实力突破政治力量对它们的限制、歧视;而科举制度则成了它们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当然,明朝的以八股文取士,并且在试卷中只能阐发程、朱之学,这对读书人的思想起了严重的束缚作用。但也有许多杰出之士,只把这些作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在获取功名后就我行我素。其中最突出的大概是浙江的王守仁。他在考取进士、获得政治地位后,开始时像一般的正直士大夫一样,上疏弹劾权奸,差点送命;后来就学乖了,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讨好太监——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建立功业;同时又开展讲学,他的政治声望在这方面给予他极大的有利条件,终于形成了王学——“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思想解放的发端。换言之,他在参加科举考试时,虽然不得不秉承程朱思想写八股文,但在考取进士以后,他就不照程、朱思想行事了,后来还采用了类似后世所谓的“修正主义”手法,打着“程朱”旗号反程、朱。而他之赖以做成这些事情的政治地位,则归根到底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的。

所以,科举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极其重要而复杂的,但它的作用远未被充分阐明,以上所述也不过是管窥所及的一隅之见,即使没有讹误,也只是涉及了真相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我很希望学术界能对这方面给予较多的关注。

多洛肯博士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时,一直致力于明代浙江进士的研究。我想,在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的今天,这种区域性的断代研究实在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的成果积累得多了,我们才有可能对科举制度开展较全面的断代研究。现在,多洛肯博士的这一课题已取得了成果,并且即将出版;这虽然还是一项初步的研究成果,但已给了我们

很多启发,因而是值得感谢的。我衷心希望多洛肯博士能在今后提供给我们更多、更出色的成果,也衷心希望学术界能重视科举制度的研究,不断有扎实的成果问世。

Abstract

The feud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the effective system in which the talents were selected to fulfill the positions of government in the ancient time. It was also th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emperors to continue the dynasty. Since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s, the methods of talents selection was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quantity of talents selected in Zhejiang, east China, was ranked in the front row. In Ming dynasty, Jinshi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Zhejiang became the well-known regional elite of social science in terms of the figures and performance.

Zhejiang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Since Song dynasty, it has been the advanced area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conduct an overall, deep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f Jinshi of Zhejiang in Ming dynasty,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of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so as to derive the clu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The perspectives are as follows:

1. Classify and calculate the quantity of Jinshi of Zhejiang in Ming dynasty.
2.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scattering of Jinshi in

Ming dynasty and find out the regularity.

3. After Song dynasty, the economy of Zhejiang was ranked in the front row of China, which laid the firm physical foundation for young scholars to attend the feudal examinations. The engraving and private book-collecting industries in Zhejiang in Ming dynasty was highly develope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my research.

4. The advanced educ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Zhejiang in M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figures of Jinshi in Zhejiang were ranked the first among the provinces. 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a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official institutes,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primary schools as well as their roles of nurturing the talen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last part is one of appendixes of academic data: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gures of Jinshi, regional scattering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articularly the scientists. Meanwhile, a comment was also mad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egional scattering of dramatists and the advanced areas of economy and culture.

目 录

序	章培恒
引论	1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述评与选题的意义与方法	1
第二节 明代浙江进士的基本文献	8
第一章 明代以前的浙江历史文化传统	18
第一节 先秦浙江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18
第二节 秦汉时期浙江社会的缓慢发展	26
第三节 六朝时期浙江的崛起	34
第四节 隋唐五代浙江的发展	42
第五节 宋元时期浙江的繁荣	52
第二章 明代浙江社会经济的繁荣兴盛	73
第三章 明代浙江文教事业的发达	97
第一节 浙江刻书藏书事业的发达	97
第二节 明代浙江科举教育的兴盛	111
第三节 明代浙江理学家的兴盛兼论戏曲家的涌现	138
第四章 明代浙江进士特色论	145
附录 明代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	189
汉语拼音人名索引	402
主要参考文献	433
后记	吴 格

引 论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述评与 选题的意义与方法

在明代文史研究领域,“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近千年的中国,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科举制度,即从一千三百年前隋代设立进士科之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这是平民入仕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制度中历时最久、变化最小而影响最大的一种制度。在隋唐以后几乎所有士子都与科举考试发生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的是少数人。科举出身成为入仕的首要途径,尤其是中高级文官多由科举登进。明代就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在1300年间,进士出身者构成了官员队伍中的基干和主体,是士阶层中文化素养最高的部分,政治的演进、朝代之嬗变皆与之密切相关。这一制度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人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是明证。这种价值观念既弥漫于整个社会,又深入社会的每个阶层。科举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科名的士绅阶层,而相当多的中举者是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据何炳棣研究成果表明,在明代

^①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二》。

则有 46.7% 的进士出身于寒微人家。因此可以证明科举制度为社会的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升进之路,促进了阶级的流动,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制度。^①

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就有人开始进行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真正用科学的眼光对其进行研究的,还是 20 世纪科举制废除之后的事。古今中外研究科举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 1936 年印行)、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近年来,出版了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陈茂同的《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这些论著对科举制度作了通论性质的论述。而在科举制的断代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有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 年版)、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4 年中文版)、贾志扬(John Chaffee)《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英文版)等等。有关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首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 1958 年版),迄今仍为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必读书,其次是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日本译为《科举:近世中国社会的立身出世阶梯》),(美)艾尔曼《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去年又出版了黄明光的《明代科举制度研

① Ping-li Ho: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版)一书,是书所设立的明代社会的科举观、明代乡试研究、明代会试研究、明代殿试研究、明代进士鼎甲研究、科举考试官研究、科举考试试卷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科举制度状况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等章目,对明代科举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诚然,是书也有不少疏漏与错误,如将会试名额与乡试名额混为一谈,众所周知,会试的录取则是从宣宗后南、北、中按一定的比例录取的(除去景泰年间);另对乡试主考官的阐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又如黄氏对明代鼎甲的籍贯分布的研究,明显的是某些统计数据缺乏应有的考订,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对状元的籍贯简况的叙述中,没有对基本史料进行考订,各直省的分布统计明显是错误的,并对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多出状元进行了分析说明,是书所引史料并不能与历史事实相符合。就拿福建而言,有明一代,延平府、建宁府并没有士子高中状元,而撰者却引用延平府、建宁府两府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如何向学的材料来说明问题。这是黄氏的不考之论。或许黄氏将洪武乙丑科状元建宁县人丁显误作建宁府人,此建宁县属邵武府。黄氏对明代榜眼、探花籍贯结构的阐述中连浙江、江西这样的科举大省都没有统计进去,遑论其数据的科学性,很明显此为不实之论。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研究,目前只有几篇文章,可分为四类:一是介绍传世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其收藏状况的,如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概述》(《天一阁丛谈》)、《北京图书馆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介绍》(《文献》1985 年 2 期);二是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作进士籍贯分布研究,如陈国生《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研究》(《学术研究》1998 年 1 期),此文前后矛盾,错误百出;三是作人才学研究,如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国东

南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四是进士登科录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局部对勘研究，如李大东《明代进士登科录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对勘》（《天一阁藏书文化论文集》，1998年）。这些研究在时间上明清综合考察，地域上或全国或大区域考察，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局限于籍贯的地理分布，尤其是陈国生、沈登苗的研究数据很值得推敲。何氏的研究是对定量与定性结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以上文章代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系统研究的不见，综合起来思考进士群体的也少见，但为系统的明代进士群体研究创造了条件。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建德人”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自古以来即以“人杰地灵”著称，才人辈出。自宋代以来，便被视为学术文化发达之区，美誉流传，至今不衰。要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明代浙江进士问题，应做到宏观上的把握与微观上的剖析，应该将“明代浙江进士研究”置于浙江人文历史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上，从教育、科举等角度，深入考察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中的问题，以便我们更透彻、全面地认识浙江思想文化史发展的脉络。对于“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整理、统计明代浙江进士名录及其人数。以往不少学术论著统计浙江进士人数时，多将《浙江通志》作为主要依据，本人以为不够全面。现以清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及张朝端《明贡举考》三种史乘为底本，又广泛参校两浙明代志乘，并尽可能利用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宁波天一阁、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明代登科录，以及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杰明·艾尔曼先生有关科举研究的网站(<http://www.sscnet.ucla.edu/history/elman/classBib/#13>)所登录的史料,经深入研究、细致排比及考订,从而作出客观的评价。

2. 探索明代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找出其规律性,并考察其原因。

3. 南宋以后,浙江社会经济在全国居领先地位,经济富庶为读书人争取功名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环境更与人才的多寡密切相关。物质文化发达,往往伴随着非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因而经济发达地区总是涌现出大量的人才;明代浙江刻书业和私家藏书业空前繁荣,此类现象,均将成为本人探索的重点。

4. 明代浙江科举教育发达,是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的重要原因。本人将对明代浙江地方的官学、书院、小学的活动作全面考察,并探索其对于造就科举人才的作用。

5. 探索浙江进士人数及其地域分布与明代学术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理学家的关系。兼论明代戏剧家的地域分布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关系。

关于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现知有潘光旦先生的《嘉兴明清两代望族》(上海书店,1990),倪士毅先生的《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等书。《浙江古代史》叙述了自五万年前的“建德”人至1840年以前的浙江政治、文化发展概况,却对明代进士问题未有涉及。浙江社科院顾志兴研究员《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考察了自东汉王充开始的浙江历代藏书家与藏书楼的兴盛概况。藤复等主编的《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浙江文化史展开专题研究,但也没有涉及对于进士的研究。近年来,浙江省花费不少财力人力,编纂了《浙江教育志》等各类专志。我认为,《浙江教育

志》的编纂不够理想,尤其是对浙江古代教育的论述语焉不详(甚至在材料的处理上也出现了不少硬伤)。本人以为,学术界对“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涉及的诸多问题,迄今只发表了一些浅析式的论文,而且引用的文献资料和数据也缺乏应有的考订辨析,对明代浙江进士这一特殊地域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关注,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发掘。总的来说,“明代浙江进士研究”的成果仍过于零散,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本人不揣谫陋,将从社会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明代浙江进士”这一特殊群体,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学术发展史等问题,经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以期把握明代浙江进士分布的特点,找出其规律性与共性,并对此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本人认为,“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有助于我们透彻、全面地认识浙江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为浙江地方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同时为浙江“建设教育强省”的发展规划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

“明代浙江进士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对浙江籍进士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及评价。本人欲从“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明代文教事业的兴盛与科举”、“明代浙江进士的盛况”、“明代浙江进士与学术史发展”等方面着手,采用比较、统计、制作图表等方法,促进研究课题的完成。比较的方法是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本人不但要将浙江与其他各省的科举情况作横向比较,也将对不同时期的浙江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比较。统计的方法是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设置若干坐标,然后进行全面的统计比较。研究中有些指标是可以通过数量来分析的,如著作的品种与数量,藏书家、理学家的人数及籍贯等等。

本课题重点纂集有明一代浙江籍进士的生平小传。自从事

此项工作以来,本人旨在搜集有明一代浙江进士的姓名、科第(乡试第几、会试第几、殿试第几、治何经)、排行、字号、生卒年、乡贯户籍、主要仕履(一般指初仕官与终仕官)、谥号、主要著述等方面资料。《明史》有传者大多略言之,无传者依据有关史料撮述其要,注明出处。旧说有误者正之,文献不足者阙之,异说可参者并存之。力争做到言出有据,无征不信。对明代 3458 名历科浙籍进士的名录的整理考订,嘉靖二十九年各科进士以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为底本,并据现存登科录、《题名碑录》校勘。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图书馆所收藏的《题名碑录》均为光绪刻本,每科均有缺泐现象,尤其是嘉靖后各科刻板模糊,缺泐甚多。所以应参考时代较早的《题名碑录》刻本国家图书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总集类》460 册收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不分卷明洪武至崇祯各科不分卷》,是书系雍正十年刻本,缺泐甚少,惜是书缺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四年各科题名,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清佚名刻本《明进士题名碑录》三册,录洪武四年至弘治乙丑,万历二年至四十七年进士,又藏有清抄本《明进士题名碑录不分卷》一册,录天启二年至崇祯十六年进士,这些史料大体缺泐甚少,有很高的比勘价值。另上图古籍部藏有华文书局 1975 年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雍正年间刻的《明代进士题名碑录》的影印本,以资比勘。经过几个月的大量深入地考订,本人已基本完成 3458 名浙籍进士的名录考订整理工作,以 89 科浙籍进士为时限,以科第的甲第及名次为排列顺序,打破各方志以府县为顺序的次序,以便检阅。另对浙江《通志》、《府志》、《县志》中普遍存在的细大不捐的通病,予以辨证、辑佚、补遗。如万历三十五年各《方志》及各《碑录》均将北直隶保定府新城县籍进士与南直隶池州府建德县籍进士误作浙江杭州府新城县进士与严州府建德县进士,此据万历三十五年登科录与同年便览。至